

狭隘的保守主义心态厚此非彼也是脱离实际、不合时宜的。在洪先生看来,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继承传统宗教与文化之精粹,并对世界优秀文化兼收并蓄。这是因为,儒佛道三教本身就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内部互相冲突、融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所以在世界多元文化对话的今天,儒佛道三教圆融互补的历史也能给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模式提供某种借鉴。

洪先生认为,儒佛道的哲学建构虽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说,各家的出发点与归宿大都是“人”,思想核心也大都是“人”,不同之处在于对人的价值取向与对人的价值实现途径等问题上。从文化结构上看,基于对人及人生问题的探讨,儒佛道三种文化形态在内容上互为补充与相互制约,都是在“人学”的基础上实现的,都是围绕着“人学”而展开的,这一点为儒佛道走向相融互补提供了重要契机。洪先生认为,儒家谈人仅限于现世,谈人的实现,强调的是主体道德上的自觉完善,对于摆脱现实烦恼、走出人生困境却鲜有涉及,而佛、道两家则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补充。道家强调效法自然,道家道教都想在现实的社会之外另觅仙境,另求逍遥人生,以求摆脱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的困境。而佛教则扩大了“人生”的内涵,将现世延长为“三世”,对人的未生之前与已死之后做了系统说明。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解释现实人生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强调对道德行为的自作自受,这就确保了佛教为善去恶道德说教的威慑性及其人生理想的恒久魅力。

回溯三教关系由最初的“三教一致”、至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三教冲突与融合,乃至入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昭示了三教由相异冲突走向相异共存,最终圆融互补的历史进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三教关系的曲折历史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曲折历史,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从最初的异端而最终成为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说明了文化的普世性,另一方面则彰显了中国文化高度的包容性。这对于我们借鉴、吸收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对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也具有某种指导性。

由此可见,传统宗教与文化内蕴的“人学”特质正是三教关系圆融互补的内在基础,也正是得益于三教圆融互补,才使得传统宗教与文化的“人学”特质不断充实、完善。二者之间的这一内在联系,致使在当今世界文化竞争、对话的形势下,传统宗教与文化能够在保持民族文化性格的基础上借鉴、融汇外来文化,不断发展自身,进而强化民族文化性格,在全球化语境中发挥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优势。

综上所述,《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以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为着眼点,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内在精神的解读与创新,在宏观层面上关注三教关系与中国思想文化及时代课题之互动;在微观层面上注重三教各自的历史特点及三教之间的互动,注重从内在精神上把握三教关系的内涵,立体地建构起对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的理解。既有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也有凝炼概括和宏观把握;两者的有机结合使该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其研究视角不仅是对以往惯性研究思维的一大反思,更是对三教关系研究新范式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作者胡永辉,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视角独特 风格别具

——《“性空”至“妙有”》评介

潘桂明

近年来,随着佛教思想研究的深化,学界的兴趣似开始从隋唐宗派转向六朝学派,府建明博士的学术专著《“性空”至“妙有”》(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成为六朝学派领域研究的又一成果。

该著以“魏晋般若学流变与转向”为核心论题,就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佛教“中国化”问题,通过若干关键人物及其思想的系统梳理,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论证,做出别具风格的独立解释,获得颇有个性化的研究结论,展示了作者理想的知识结构和坚实的学术素养。

为了厘清般若学在中国的流变和转向,作者创造性地提出般若学的两重特质(宗教性、义理性)和三重向度(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并以此作为全部论述的知识基础,展开层层推进的逻辑论证。这种考察方法和思维路径,对佛教思想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此外，作者在著作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也颇有新意，值得我们关注。如认为，中观学派的“诸法实相”概念造成中观义学与佛教实践的矛盾，致使它“无法真正承担起作为宗教哲学的历史重任”（109页）。这一矛盾的揭示，蕴含了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化的历史必然的阐释。在“僧肇与中观学的融会”一节中，作者沿着“僧肇对中观学的正传”思维路径，进一步阐述了僧肇“使中观学由域外之学真正变成了中国之学”的理论依据（131页）。又通过对《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的分析研究，指出前论的最大特点是“将中观学的方法与玄学的概念相结合，以此变成中国佛教自身的理论”，故而“在理论思维的层面，已经远远高于同时期玄学的水平”；后论则可以界定为“中国化的中观学论著”，并被判断为僧肇中观学的“代表作”。这些观点，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在对《物不迁论》具体分析后作者指出，僧肇“在醉心般若中观学之精妙思辨外，对佛教终极信仰的追寻应尤为重视”（156页）。义理与信仰的张力，在不少六朝佛教学者身上得以体现，这正是学界需要加以特别留意的，因为它涉及该时代思想界的一些重大课题，关系到知识界精神生活类型的选择。作者又通过慧远思想的考察，认为罗什僧团中观般若学的“中国化”和涅槃学转向，还与同时代毗昙学、小乘禅学竞起，以及内地固有“神不灭”思想有联系，这也别有趣味，反映了作者学术思考的深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很愿向学界推荐这部著作。

（作者潘桂明，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道教研究的新动向：区域道教研究

——兼评孔令宏、韩松涛著《江西道教史》

张广保

近年来国内外道教研究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此即关注中国历史上地域道教的研究，注重把握道教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对此，有学者称为道教研究的“本土转向”。关于地域道教的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外道教研究界都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国外方面已出版的成果有美国学者韩书瑞的《北京：庙宇与城市生活（1400—1900）》（2000），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研究院高万桑的《1800—1949年间北京的道士：城市道士的社会史》、美国刘迅的《道教现代化：民国时期上海的革新、在俗修行和内丹社团》（2009）等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有陈耀庭《上海道教史》（1989）、李养正《新编白云观志》（2007）、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2000）、黎志添《香港及华南道教研究》（2005）、吴亚魁《江南全真教研究》（2008）以及樊光春《西北道教史》（2011）等等。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道教与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之关联，重视从城市社会史的角度来理解道教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复杂作用，尤其是注重分析道教仪式及修炼实践对规范、组织传统中国城市社区民众生活之作用。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矫正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家在“西化”浪潮的重袭下，为了回应以科技文明为导向的西方文化挑战，在重建中国近世社会时，一直致力的“去道教化”之社会、思想之实践。这对于真实再现道教在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之多重作用，无疑是很有益处的。与国外学者有所不同，中国道教研究者们虽然也在区域道教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但关注的重点却在地方道教史方面，注重梳理地方道教传承、流布之史实，其历史学、宗教学的取向明显重于国外同行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取向。这说明由于中、外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外道教研究者在处理区域道教问题时，也呈现研究视域的分别。此外，与欧美同行将关注重点置于城市道教不同，国内道教研究者更偏好处理象江南、西北或者分省这样大的区域。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近欧、美道教研究者也开始走出城市道教，关注道教在更大的区域活力。据报道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澜、范华，美国哈佛大学詹姆斯·罗宾逊，夏威夷大学的普尔·安德森等人正联合开展“湖南中西部的道教仪式、塑像和祝祷文”研究计划，法国高等研究院的劳格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康豹也会同浙江道教学者致力于“浙江东部庙宇体系、世系和地方团体”之研究，而美国麦吉尔大学肯尼思联合中国同行的“当代福建道教仪式与地方社区”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外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研究院的高万桑主持的，由中外道教学者共同参与的“近现代中国城市道士与庙宇研究计划——以广州、杭州、南阳、武汉为例”大型研究项目。国外道教研究者的这些研究项目多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立